

论知识青年“再教育”运动

赵文远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15)

摘 要:“再教育”思想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于“文革”时期。它与毛泽东对新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有很大关系。“文革”时期知识青年“再教育”思想的内涵被概括为在“三大革命”(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它是“文革”前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分水岭,使“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异化,被完全纳入了“文革”的轨道,成了“文革”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关键词:知识青年 “再教育”运动; 政治斗争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50(2012)04-0012-04

国内学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有不少研究,但是对知识青年“再教育”研究还很少见。“再教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联系,但是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知识青年“再教育”是“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政治化名词,是一个政治印记。本文正是基于“再教育”运动的这个特质,把它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特殊历史进行考察,从一个独特视角认识“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再教育”思想的提出

知识分子“再教育”思想与20世纪50年代党内逐渐发展的“左”倾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具体来说,“再教育”思想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教育制度的不满有很大关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肇始于1951年,这是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普遍经历的一次真正触及灵魂、脱胎换骨无法忘记的历史过程。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是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毛泽东改变了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分析,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的改造过来,改造成

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知识分子的改造主要是世界观的改造,就是“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按照当时的政治宣传,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是“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教育”^[2]。

之后,毛泽东把对知识分子的不满转移到教育制度上,对新中国教育制度很不满意。1958年毛泽东提出“教育革命”,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跃进年代,全国大、中学校办工厂、办农场,学生走出学校,上山下乡,参加工农业生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生都不读书,上山找铁矿、找煤矿等,干了不少荒唐事。1964年前后,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的学校,还多次强调学生要少读书,“书读得越多就越蠢”,并列举了李时珍、富兰克林、高尔基等古今中外许多人和事来证明自己的意见。接着,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和8月的《十六条》明确提出彻底批判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196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文章,全面否定建国17年的教育工作,把建国

收稿日期:2012-05-18

作者简介:赵文远,男,河南西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7 年的教育说成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的一套破烂”,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按照这种说法,建国 17 年以来,全国大、中、小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全部值得怀疑,他们的世界观即便不是封建主义,也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1968 年《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更明确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的新知识分子“过去是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由此引出下乡知识青年的“再教育”问题。当时的政治宣传说,知青下乡前,在学校里受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长期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实际,所以必须由贫下中农给予“再教育”。

另外,“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失控与“再教育”思想的提出也有很大关系。红卫兵组织的分化并且很快演变成派性武斗,无政府行为猖獗,引起毛泽东的极大不满。1968 年夏天,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聂元梓、蒯大富等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并决定向学校派进“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但是,“工宣队”并没有制止住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寄予很大希望的红卫兵小将们竟然如此不听话,未来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素质如此低下,使毛泽东感到很失望,认为有必要对这些小孙悟空们实施“再教育”。接着,毛泽东发表指示,提出知识分子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教育。同年 12 月 22 日的《人民日报》在发表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中加编者按,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知识青年“再教育”运动由此展开,红卫兵组织派性斗争从此消弭。

二、知识青年“再教育”思想的内涵和实践

关于“再教育”的话毛泽东所说的并不是太多,也没有对这个方面做过明确的阐述。根据当时的宣传,所谓“再教育”是指下乡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1968 年 11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带好知识青年是贫下中农的光荣职责》中,明确提出下乡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需要,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是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保证社会主义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需要”。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知识青年“再教育”这项光荣而重要的任务交给贫下中农?

这与毛泽东的农民(主要是贫下中农)观有重大关系。毛泽东对农民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充分估计了农村贫苦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他就明确指出,在农村贫农属于半无产阶级,贫农最革命,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他更明确指出,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大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更加突出。毛泽东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1]他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四清”运动期间,中共中央的《前十条》文件提出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都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文革”爆发后,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达到了顶峰。1968 年 8 月,为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夺取教育权,毛泽东指示:在城市,工人阶级要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同年 12 月,提出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中,我们深深地体悟到贫下中农在中国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不仅认为贫下中农的革命性高,而且还认为他们的思想最干净,道德水平高并且充满了智慧。1942 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就指出“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1958 年,他就公开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64 年 7 月,毛泽东在同他的侄子毛远新谈话中说,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农民知道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

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3]正是怀着对农民的这种偏爱,毛泽东才提倡城市青年学生要利用寒暑假,参加社会实践,到工厂、农村,接触工农群众,增长才干,增加知识,转变思想感情,这样很有好处。

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工人阶级去完成呢?这恐怕与当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对落后和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制度,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的思考有关系。“文革”前后,我国国民经济基础薄弱,国营厂矿企业规模小,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不可能接受大批的城市就业人口。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想中,始终有一种乌托邦浪漫主义情调,这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表现得很明显。在毛泽东的理想社会里,人民公社就是工农商学兵结合,里面不存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劳动差别,全国就是一个大的人民公社,是一个理想社会。把大批知识青年派到农村去是实现这个理想社会的一个步骤。

“再教育”思想提出后,全国各地积极响应,纷纷成立农村大队干部领导下的以贫下中农为主体,有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参加的“再教育”领导小组。这种所谓“三结合”的领导小组,由于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都属于“再教育”对象,没有发言权,实际权力掌握在农村大队干部手里。落实“再教育”思想的另外一个措施就是以知识青年集体户为单位设立贫农户长制,户长由政治思想觉悟高、工作责任心强、生产作风好的老贫农代表担任。^[2]据说实行户长制是为了能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的政治作用,由他们对知识青年进行党的基本路线、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

阶级斗争和参加生产劳动是“再教育”的两项重要内容。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中曾提出,阶级斗争是青年学生的一门主课。所以,参加阶级斗争成了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知青不仅要听贫下中农讲旧社会的苦难史,听老红军讲革命故事,吃忆苦思甜饭,培养阶级感情,还要参加形式多样的大批判、小评论以及批斗会。按照当时的宣传,就是要让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摔打,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对他们加强教育”。只有积极参加阶级斗争,才是真正地接受“再教育”。

参加生产劳动是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又一门主课。1965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

田……真是害死人。”^[4]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成了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依据。参加生产劳动一是向贫下中农学习农业技术和知识;二是接受生产劳动教育,磨炼艰苦奋斗的品质,通过艰苦劳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文革期间,一千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在祖国各地参加生产劳动,进行劳动锻炼。一位曾经在西双版纳下乡的知青回忆说“我下乡所在的西双版纳国营农场以天然橡胶种植为主业,为扩大橡胶种植面积,开挖梯田的大会战长年不断,知青在一年中没有农闲的时节,即使是艰苦的生产劳动也带着浓烈的政治色彩,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胶(橡胶)不要命’,‘种出争气胶,气死帝、修、反’等口号的鼓动下,知青们‘吃在山,住在山,不完成任务不下山’。知青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十年间挖山不止……”^[5]

三、对“再教育”运动的一些思考

“再教育”运动是“文革”前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它使原本以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演变成了一个涉及全国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是不成功的,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验教训。

首先,贫下中农不能承担起“再教育”的政治重任。1949年以前,贫农因为人数众多且革命性较强,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和革命的主力军。新中国成立后,贫下中农在土改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是主力军,是共和国的基础,这些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6]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撰文特别指出“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1]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毛泽东又提出要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1957年到“文革”爆发,几乎每年都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可是到了1968年,一向要受教育的农民却突然变成了教育者,并且还变成了要担负教育无产阶级接班人、批判资本主义的重任。“再教育”思想把贫下中农的地位一下子抬得很高,给予其施教者的地位和权力。可是,就当时的贫下中农的知识水平和政治素养来说并不能承担起这个任务。贫下中农基本上没有上过学,本身是文盲或者半文盲,自身还需要教育,现在却让他们去教育城里下乡的初、高中毕业生,这个决定没有经过科学论证。革命性强不等于有比较高的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丰富。贫下中农

在农村生产上可以充当师傅,在政治、教育等方面并不能胜任师傅的工作。有相当部分的贫下中农甚至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定义都搞不准确,怎么能承担起对知识青年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任。

其次,农民排斥“再教育”运动。当时的农村刚刚从三年灾难中逐渐恢复过来,农民还解决不了自己的温饱,突然要接收大批的城市人口。知青的到来并没有增加土地,所以连贫下中农都认为,这些知青下乡是和他们争口粮,对于知青下乡内心存在着排斥情绪。至于“再教育”,农民无法搞懂这个高深的理论。不过,农民有农民的智慧,他们不像政治家们那样思考问题,他们把知识青年“再教育”问题看得实实在在,认为所谓“再教育”就是“这些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已经不管用了,城里不稀罕要他们,因此只能下放到乡下再接受一次教育”^[7]。

再次,“再教育”运动的目标没有实现。“文革”中,知识青年在下乡前对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并没有深入思考,他们是怀抱着“大有作为”、改变农村和教育农民的雄心壮志到农村去的。可事实上,“再教育”思想已经决定了他们到农村去的命运。知识青年从不可一世的革命小将,一夜之间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而地位发生如此急剧变化的当事人竟浑然不觉,许多到农村去的青年,起初大都是怀着到农村去大干一场的理想,后来当理想破灭时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很多知识青年当时对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包含什么意思根本不曾去想。“日后才发现那个‘再’字很可怕,它毫不留情地使知青身陷于一个很低的层次,从而去接受又一次无情的‘教育’。”^[7]

经历“再教育”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很多知识青年在贫穷闭塞的农村长期生活,从事的是繁重的生产劳动,吃的是粗粮淡饭,有时甚至忍饥挨饿,生活十分艰苦。读不到可以获取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的书籍,唯一能看到的是毛主席的四部宏著。每天还要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经历“再教育”之后,知识青年并没有脱胎换骨,没有达到毛泽东所要求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一些本来被知识青年奉为神圣的东西,被搞得庸俗化了。一些知识青年丧失了信仰,对政治、社会理想完全失望。个别知青被人利用成了“反潮流”的英雄,灵魂扭曲甘当爪牙,最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很多知识青年在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下,积极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成为了农村阶级

斗争的骨干力量。这种“再教育”实践,造成了知青政治上的愚昧、人格上的扭曲和文化上的无知。

历史证明,“文革”期间,“再教育”运动既没有解决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改造世界观的问题,也没有缩小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如果说它有获得的话,那可能就是上山下乡的经历使知青真正认识了社会,解脱了当年红卫兵的狂躁、迷信和盲从,从而能够冷静地审视过去,面对现实,思考未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并没有错。不但毛泽东提出要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文革”前刘少奇、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都提出过。“文革”前我国农村过于落后,甚至连个会计都不好找,农村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到农村去。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奋斗成绩的确值得学习,至今人们对那些在农村奉献青春的知识青年还很佩服。青年人到农村接受锻炼也没有错。如果青年人已经学习了足够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自愿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同时把所学知识奉献给农村,改造农村,建设农村,这无疑是正确的。

“文革”期间知识青年“再教育”运动的错误,在于不应该把那些正值青春年少还需要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十几岁的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去,接受所谓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的“再教育”。这样不仅使广大知识青年失去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还造成我国科学技术人才的断代,严重影响了国家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文革’期间对知青的‘再教育’不仅剥夺了他们正常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择业权和发展权,是对知青一代最严重的终身伤害。”^[5]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2]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3]米鹤都.析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2):93-97.
-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5]孙向荣.我所接受的“再教育”[J].社会观察,2006,(7):40-41.
-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何申.接受“再教育”的日子[J].文史精华,2006,(5):33-38.

责任编辑:王彩红 陈 强